

歷史經驗與國家認同： 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及其展望

一、引言

在二十一世紀前夕，東亞地區最具潛在爆炸性的問題之一，就是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臺灣與中國大陸在二十一世紀到底是走向統一或分裂？這個問題不僅牽涉臺灣地區二千一百六十萬居民之福祉，影響大陸地區十二億人的希望，也衝擊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安定與繁榮。

自從海峽兩岸開始交流以來，雙方政府與民間都十分強調經貿交流。臺灣方面順應大陸近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濟情勢，企圖經由經濟交流而轉化大陸經濟與政治的體質；大陸方面則扣緊「臺灣的命脈在經濟」這項特質，企圖「以商圍政」並「以民逼官」，以加速完成兩岸的統一。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海峽兩岸關係的論述，多半集中在兩岸經貿關係^①或軍事危機^②等具體而現實的因素。雖有人注意到文化背景但未及細論；^③也有人提出「一個『文化中國』之多元政治認同」，^④但是尙未細論其理論基礎及其落實策略。這篇論文擬從歷史經驗之解釋這個問題切入，論述海峽兩岸對國家認同之核心問題，從而對未來展望提出看法。

這篇論文想提出的中心論旨是：海峽兩岸的交流應以文化交流為主，透過雙方人民的歷史經驗的分享，以奠定心靈互相了解的基礎。爲了有效地論述這項中心題旨，這篇論文環繞

① 關於兩岸經貿關係史，最出色的研究之一是：林滿紅，〈四百年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一九九四）；關於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的發展，最近的研究論著是：蕭新煌、蘇耀昌，〈剖析中國三角：中、港、臺經濟向心力和政治離心力的動態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二期（一九九八年秋季），頁八三—一〇〇。

② Jaw-ling Joanne Chang, "The Taiwan-Strait Crisis of 1995-1996: Causes and Lessons,"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thesda: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pp. 280-303; James R. Lilley and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Chun-shan Shen, "Reflections o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op.cit.*, pp. 304-309.

④ 蕭欣義，〈一個「文化中國」之多元政治認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一期（一九九八年春季），頁二二—四〇。

著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 目前海峽兩岸與民間如何論述「國家認同」問題？各種「國家認同」論述之異同如何？關鍵何在？

(2) 海峽兩岸未來文化交流的具體策略應如何？

本文第二節針對第一個問題展開分析，指出海峽兩岸都透過歷史敘述以建構不同版本的「國家認同」。第三節則針對「經濟優先論」加以剖析，說明由於華人政治文化之特殊性，華人之「國家認同」問題難以完全從經濟著眼而棄「歷史意識」而不顧。本文第四節再試就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之具體策略以及方向，提出若干看法。第五節綜合全文論述，提出結論性的見解。

二、從歷史經驗的解釋到國家認同的建立

(一)三種「國家認同」的論述

面對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華人地區之政治關係應走的方向，目前臺灣與大陸的官方及民間人士，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以下三種論述：

(1)中華民國官方的論述

中華民國政府主張未來海峽兩岸應走向統一。在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二月二十三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在八十年（一九九一）三月十四日，由行政院第二二二三次會議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中，中華民國政府宣示：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願望。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而建設統一的中國的原則有四：^⑤

- ① 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
- ② 中國的統一，應是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而不是黨派之爭。

⑤ 《國家統一綱領》，收入：《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九九四），頁四三—四六。

③ 中國的統一，應以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

④ 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

在上述「統一的中國」的主張中，最具爭議性的就是：何謂「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八月一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件中指出：⑥

①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與的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⑥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收入：同上書，頁四七—四八。

②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暫時處於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在這種解釋下，中華民國政府主張所謂「一個中國」是指理想的、未來的、統一的中國，目前的中國是處於分裂分治的狀態之下。

爲了進一步解釋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現狀之根源與本質，中華民國政府提出《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就歷史事實加以解釋指出：⑦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中國有識之士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於一九一二年建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建國初期，內有軍閥割據，外遭列強欺凌，局勢動盪不安。孫中山先生爲救中國、圖富強，創著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理想，爲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方向。民國八（一九一九）年，蘇聯共黨成立第三國際，推動世界革命，鄰近的中國便首當其衝。民國十（一九二一）年七月，少數左傾知識分子成立中國共產黨，爲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因此，共產主義開始在中國的土地上蔓延。北伐期間，中共利用軍閥割據造成的國內紛爭，製造大型暴動，走上利用

⑦《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摘要）》，收入：同上書，頁三一—四。

「武裝鬥爭」手段奪取政權的道路。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行制訂「憲法」，另外組成「臨時中央政府」，此舉代表中國再度分裂的開始。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中國全面對日抗戰，中共藉機大肆擴展根據地與武力。抗戰勝利後，共產黨武裝叛亂，席捲大陸。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在北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北。中國遂以臺灣海峽為界暫時形成分裂分治之勢。

中華民國政府認為，現在兩岸的分裂分治，就其本質而言，實為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中國」與以馬列主義為根據的「共產主義中國」之爭。這種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乃是臺海兩岸分裂分治的本質，也是今日造成中國分裂的真正原因。今日中國之所以不能統一，不是如中共所指稱臺灣部分居民想脫離中國，也不是「某些國際勢力干涉」，而是大陸的政治制度、經濟水準以及過去多次腥風血雨的大規模鬥爭，讓人對它缺乏信心。這也就是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一再強調：「只有中國問題，沒有臺灣問題」的根本原因。

(2) 臺獨人士的論述：

相對於上述臺灣官方對「國家認同」的論述方式，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士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發表〈兩國兩治，和平共存——臺灣人民對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

⑧，從歷史觀點提出另一種「國家認同」論述。這份宣言開宗明義指出：⑨

臺灣數百年來受到異族或同族的外來政權所統治，臺灣近代史是一部臺灣人民求生存、反壓迫、爭取當家作主的奮鬥史。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之下，與隔海的中國政權之間的關係，雖然由緊張而趨向緩和，但基本上國共兩黨皆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以臺灣與中國的「統一」作為既定目標，易言之，臺灣迄今仍處在被中國併吞的陰影之中。

爲了深入論述上述「兩國兩治，和平共存」的主張，這份宣言從歷史觀點解釋歷史上的臺灣與大陸關係指出：⑩大陸性格的中國歷代政權無視於臺灣之存在，直到十七世紀，明代的管轄權仍止於澎湖而未及臺灣，故《明史》將臺灣列入〈外國傳雞籠山〉。一七七二年清代《雍正實錄》所載詔書：「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康熙）神武遠屆，納入版圖……」，可以視爲對中共政權所謂「臺灣自古即屬於中國」的有力反駁。

⑧ 刊於：《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十四版。

⑨ 同上註。

⑩ 同上註。

這份宣言接著指出：鄭成功在一六六二年驅逐荷蘭人，占領臺灣，鄭氏三代據臺二十一年，是華人在臺建立統治政權的開始。一六八三年，施琅率清兵打敗鄭氏家族，清廷經過一番爭論才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翌年清政府設一府三縣，直轄於臺廈兵備道之下，這是臺灣首次與中國發生直接的政治關係。從一六八三年至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與中國經歷了二百一十二年的歷史。然而這二百多年的臺灣歷史，其獨特性值得注意。由於鄭氏據臺期間揭舉「反清復明」旗幟對抗清朝，一方面使清政府對臺灣一直保持敵對的態度，實施海禁政策以防範臺灣再度成爲反抗者集結的「逋逃之藪」；一方面臺灣民間仍保留著反抗的意識，在清朝統治期間，至少有四十次反抗清朝的行動，其中有二十次曾擊潰清兵的鎮壓及圍攻。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渡臺的政策延續大約一百九十年，至一八七五年才完全廢止。其間移居臺灣的漢人絕大多數是冒著生命危險潛逃而來，他們不但要逃避官吏的追捕，而且要拋妻離子歷經千辛萬苦以求生存。這種海禁政策不但妨礙臺灣的開發，而且影響到日後臺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這份宣言又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第二波帝國主義勢力的浪潮來到東亞，臺灣再度受到列強的覬覦。英、法、日本都曾經在臺灣發動軍事行動，而美、德兩國也曾想占領這塊土地。一八九五年，由於清國在朝鮮半島與滿州的軍事失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年間，日本帝國在臺灣進行高壓的殖民統治，甚至將臺灣捲入其侵略戰爭

中。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臺灣的武裝抗日或非武裝抗日運動，間或受到中國大革命變天、改朝換代的想法所影響，但主要是以護衛「本島」鄉土或爭取殖民地的民主與解放為目標，而與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內亂外患無所交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間的臺共且已提出臺灣獨立的宣言。在中國政府方面，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並未將臺灣列入行省或淪陷區，國共兩黨也都曾有支持臺灣獨立的言論。

這份宣言又指出：日本政府有效統治臺灣達半個世紀之久，對臺灣的影響至為深遠，它提供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對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較現代的教育，切斷與中國的大部分紐帶，生活水準遠高於騷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臺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此外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莫不影響了臺灣文化。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臺灣人變成日本人的企圖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臺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離開臺灣，中國政府依盟軍命令接管臺灣，然而以上的歷史背景已經使得臺灣與中國格格不入，終於在一九四七年釀成二二八事件，死傷枕藉，創鉅痛深，這就是將臺灣勉強併入中國的後果。

(3) 中共官方的論述：

相對於臺灣官方與民間臺獨人士的論述，中共國務院在一九九三年發表〈臺灣問題與中

國的統一」的政策白皮書，提出的「國家認同」論述完全不同。在這份官方文件中，中共政府首先提出其基本主張說：^⑪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鬥的歷史。臺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繫。由於種種原因，臺灣迄今尚處於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癒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結束。

中共官方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中，看待臺灣與大陸之關係。這份文件首先解釋：臺灣古稱夷洲、流求。大量的史書和文獻記載了中國人民早期開發臺灣的情景。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三國時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誌》等對此就有所著述，它們是世界上記述臺灣最早的文字。公元三世紀和七世紀，三國孫吳政權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後派萬餘人去臺灣。進入十七世紀之後，中國人民在臺灣的開拓規模越來越大。十七世紀末，大陸赴臺開拓者超過十萬人。

^⑪ 《中共國務院政策白皮書：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轉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至公元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時，總數達到五十點七萬餘戶，二百五十四萬餘人。二百年間增長二十五倍。他們帶去先進的生產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到東，筆路藍縷，披荆斬棘，大大加速了臺灣整體開發的進程。這一史實說明，臺灣和中國其他省區一樣，同為中國各族人民所開拓所定居。臺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即使在日本侵占的五十年間，這一基本情況也沒有改變。臺灣的開拓發展史，凝聚了包括當地少數民族在內的中國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國歷代政府在臺灣先後建立了行政機構，行使管轄權。早在公元十二世紀中葉，宋朝政府即派兵駐守澎湖，將澎湖地區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元朝政府在澎湖設置行政管理機構「巡檢司」。明朝政府於十六世紀中後期，恢復了一度廢止的「巡檢司」，並為防禦外敵侵犯，增兵澎湖。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鄭成功在臺灣設「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臺灣擴增行政機構，加強了對臺灣的治理。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設「分巡臺灣兵備道」及「臺灣府」，下設「臺灣」（今臺南）、「鳳山」（今高雄）、「諸羅」（今嘉義）三縣，隸屬福建省管轄。一七一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員測繪臺灣地圖，勘丈全境里數。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設「巡視臺灣監察御使」，改「分巡臺灣兵備道」為「分巡臺廈道」。而後又增設「彰化縣」和「淡水廳」。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復改「分巡臺廈道」為「分巡臺灣道」（後又改為「分巡臺灣兵備道」），增「澎湖

廳」，定「臺灣」為官方統一的名稱。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清政府為進一步經營和治理臺灣，再增設「臺北府」及「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和「基隆廳」。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劃臺灣為單一行省，任劉銘傳為首任巡撫，行政區擴為三府一州，領十一縣五廳。劉在任內，鋪鐵路、開礦山、架電線、造商輪、興辦企業、創設新學堂，把臺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大大向前推進。

這份中共官方文件接著解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五十一（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歷史經驗說：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翌年，清政府戰敗，在日本脅迫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消息傳來，舉國同憤。在北京會試的包括臺灣在內的十八省千餘舉人「公車上書」，反對割臺。臺灣全省「哭聲震天」，鳴鑼罷市。協理臺灣軍務的清軍將領劉永福等和臺灣同胞一起，與占領臺灣的日軍拼死搏鬥。中國大陸東南各地居民為支援這一鬥爭，或捐輸餉銀，或結隊赴臺，反抗日本侵略。在日本侵占臺灣期間，臺灣同胞一直堅持英勇不屈的鬥爭。初期，他們組織義軍，進行武裝游擊抵抗，前後長達七年之久。繼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後，他們又會同大陸同胞，先後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及至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島內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群眾運動更加波瀾壯闊，席捲臺灣南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反對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中國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等結成同盟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簽

署的《開羅宣言》指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土地，例如滿州、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簽署（後蘇聯參加）的《波茲坦公告》又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日本投降條款》規定：「茲接受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茲坦公告中的條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國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於臺北舉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至於中國主權之下。至此，臺灣、澎湖重歸於中國主權管轄之下。

（二）三種論述的異同

現在，我們可以分析以上三種不同的「國家認同」論述內容的異同。首先，我們從三者的共同性來看。這三種「國家認同」論述最大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企圖通過歷史解釋而建立「國家認同」。

從歷史經驗的詮釋以凝聚「國家認同」，這是當前海峽兩岸華人政治文化共同的特徵。臺灣官方從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興起切入，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國共內戰的歷史經驗，解釋導致當前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現狀之歷史根源。臺灣社會中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士，則從十七世紀

以後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說起，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其歷史的斷裂性，臺灣歷史所展現的獨特性則是在於反抗意識的強烈。臺獨論述也特別突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經驗的重要性。中共官方則從近代中國之被帝國侵略的歷史事實出發，論述只有臺灣與大陸完成統一，中華民族的創傷才能獲得癒合。以上三方面人士的「國家認同」論述，結論雖然南轅北轍，但是他們之從歷史經驗出發這一點則完全一致。

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海峽兩岸這三種「國家認同」論述，在「從歷史解釋出發論述國家認同」這一項共同性之下，又互有重大的歧異性在焉。一言以蔽之，三者論述歷史經驗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出現很大的差異。臺灣官方與中國大陸官方都是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中論述臺灣與大陸之關係，雙方都認為：目前兩岸之統獨問題都是在中國近代歷史脈絡中產生的。但是，兩者仍有同中之異：臺灣官方強調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的主流在於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三民主義理想，但是共產黨的興起以及後來的國共內戰，導致三民主義理想的挫折，也造成目前海峽兩岸分裂分治之現狀。中共官方則在反帝反殖民的脈絡中解釋中國近代史，並將臺海兩岸關係放在這個脈絡中加以理解，認為統一臺灣是「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鬥爭」。

臺灣官方與中共官方解釋中國近代史的脈絡，與臺灣的臺獨人士的主張構成強烈的對比。臺獨人士強調臺灣歷史的獨特性在於反抗意識的強烈，他們認為「臺灣近代史是一部臺灣人

民求生存、反壓迫、爭取當家作主的奮鬥史」，並將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來的歷史解釋為「臺灣從異族殖民的處境躍入同族殖民的苦境」。臺獨人士這種解釋歷史的脈絡，與臺灣及中共官方顯然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臺獨人士對日本統治臺灣五十一年歷史特別加以強調，認為日本殖民時期「提供了……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切斷與中國的大部分紐帶……成功地使臺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相對而言，中共官方則強調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臺灣人的反抗運動。這三方面的人士都是從當前的政治需要與政治立場出發去選擇歷史事實，並透過歷史解釋而企圖使「過去」為「現在」服務。

綜合本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現階段海峽兩岸官方與民間三方面的人士對於臺灣與大陸關係的論述，都是透過歷史解釋而提出。這種「國家認同」的論述方式，是華人政治文化特質的一種表現，也顯示華人的歷史意識之深厚。從這一項特質出發，我們主張：為了解近百年來海峽兩岸人民由於歷史經驗的斷裂所導致的互相了解的不足，分享雙方的歷史經驗是促進雙方良性互動的重要途徑。但是，在我們進一步論述這項主張之前，必須先檢討「經濟優先論」及其對海峽兩岸關係之主張。

三、「經濟優先論」及其批判

(一)「經濟優先論」及其主張

本文第二節所分析的當前海峽兩岸從歷史解釋建構「國家認同」的做法，必然會引起「經濟優先論」者的質疑。這種質疑的主要論點如下：(1) 民族國家在二十一世紀即將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需求為基礎的全球化經濟。(2) 因此，現階段中國大陸與臺灣官方及民間臺獨人士，以民族國家概念為基礎所提出的各種「國家認同」論述業已過時，不能迎合二十一世紀超國界經濟活動的需要。我們進一步闡釋上述論點。

(1) 近年來在國際知識界，「民族國家終結論」甚囂塵上，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 是這種論述最重要的發言人。大前研一在《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⑫這部書中指出：在二十世紀末期發揮極大影響力的經濟動力，

^⑫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McKinsey & Co)

已經對民族國家的角色發出了質疑。「民族國家」不見得是個能夠思考精緻活動的概念，經濟活動與民族國家這兩者之間不再有必然關係。以個別獨立的民族國家作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必須仰賴許多核心價值觀的支持才得以維持，例如西方國家所實踐的民主自由制度，甚至是政治主權這個觀念本身；但是現在這個價值觀卻亟需重新釋義，甚至需要用別的觀念取而代之。隨著二十一世紀的腳步日益逼近，「四I」——產業（industry）、投資（investment）、個人（individual）、資訊（information）——也加緊在國界內外流通無阻，曾經適合十九世紀封閉模式的地盤觀念，勢將難以為繼，尤其是資訊科技的發展最具關鍵性。大前研一接著指出：^⑬在老舊的經濟地圖上，最重要的製圖元素不外乎原材料的產地、能源、可通航的河川、深水港埠、鐵路線、已經鋪設好的道路，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界線。但是在今天的地圖上，最突出的元素卻是電視衛星訊號覆被區、廣播頻道放送區域、報紙雜誌發行範圍等，資訊已經取代時空距離和政治關係，變成影響經濟活動流通最鉅的因素。有形的疆土和政治界線雖然仍有其地位，但是兩者（尤其是政治界線）都比不上人民的知識、欲求和價值觀重要。因此，

pany, Inc., 1995), 中譯本：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六），頁二二。

^⑬ 同上書，頁四一。

大前研一斷定：⑭民族國家目前在管理經濟事務上已癱瘓無能。區域國家在本質上有優先考慮全球化邏輯的獨特能力，如果能再佐以適當的自主權，便可搖身一變，成為因應時代需要的變革促進劑，而在全球化經濟下推動繁榮富裕的環境，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前研一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另一本書《無國界的世界》中，⑮也強調在產業競爭的地圖上，國家的疆界大致已消失，消費者主權業已出現。在大前研一與德國的赫伯特·寒哲勒（Herbert Henzler）及美國的佛瑞·葛律克（Fred Chuck），為一九九〇年二月八日在紐約舉行的貿易與競爭能力會議而發表的〈邁向二〇〇五年世界的互助互立宣言〉中，大前研一等人更指出：「在過去幾十年當中，我們在已開發經濟國家中看到了由觀念、個人、投資與企業自由流通所形成的一種有機性結合。……在資訊力量直接接觸及地方社群，學術與專業和社會機構，以及公司和個人時，連體經濟的浮現會對國家的主權有所侵損。但也由於這樣一個不分國界的世界，才得以讓參與其中的經濟國有無限繁榮與富足的可能」。^⑯

(2)從上述「全球化經濟」的觀點出發，大前研一對未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係也提出一

⑭ 同上書，頁二三一。

⑮ Kenichi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0)，中譯本：黃柏棋譯，《無國界的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專業公司，一九九三）。

⑯ 宣言收入前引《無國界的世界》，頁二六九—二七一。

套看法。他認為目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向內看並以國家為重心的對策，不管在政治上多麼動人，在經濟上肯定是難以持續的作法。^{①⑦}他認為中國如果要在經濟及政治上繼續發展，就必須允許在其領土內成立許多區域經濟體，因為在二十一世紀由一個單一的中央政府來指導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國家的經濟政策確實相當困難。同時，為了有效地將其人民帶向現代社會，中國政府必須致力於教育。人民獲得教育之後，就會開始為自己著想，並努力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認為，未來的中國應走向「中華邦聯」（Commonwealth of China）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

在這種展望之下，大前研一認為臺灣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認為，隨著國民黨老一輩的消逝，臺灣必須決定自己的未來。如果臺灣對此一問題處理錯誤，就極可能遭致外敵入侵或內戰。如果應付得宜，臺灣就極有可能成為未來「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中具有領導地位的成員，並成為世界上最重要而且最自主的經濟強權之一。^{①⑧}

大前研一上述的看法，其實在臺灣的知識界並不陌生。臺灣有些知識分子已注意到日益壯大的國際化必然要消除國際間空間、時間及文化的地域阻力，但同時進一步型塑分化的地

^{①⑦} 同上書，頁二二四。

^{①⑧} Kenichi Ohmae, "Putting Global Logic Fir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1995, pp. 119-125, esp. p. 125.

域，國家作為行動的主體將日益顯現其困窘。國際主義必須復興，但卻又面臨日益分化的地域。處於全球時代的臺灣應嚴肅思考這個問題。^⑱也有人指出：世界的局勢充滿絕大的流動性，冷戰結束之後，世界正處於解構與重構的轉型期。兩極結構的瓦解，十九世紀的權力政治重返地球，聯合國只可為大國所利用，而非小國所可倚恃。真正主導世界的動力不在武力，而在經濟。亞洲之躍起靠經濟，中國人的三個社會（大陸、臺灣與香港）之受世界矚目也在經濟，這三個中國人社會構成的經濟圈之更上層樓，則有賴於「中華共同體」的建構。^⑲政壇耆宿陶百川先生也呼籲海峽兩岸共組「中華國協」（Chinese Commonwealth），聯合海內外中華民族各國家或政治實體，經過適當時期的交流、合作與協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均權統一的中國。^⑳大前研一的看法與上述臺港知識分子的意見互相呼應。

這種「經濟優先論」在許多企業界人士對海峽兩岸關係的論述中屢見不鮮。舉例言之，王永慶就主張：^㉑

^⑱ 張景森，〈如何改造臺灣的經濟地圖？〉，《中國時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一版。

^⑲ 金耀基，〈在世界「冷和平」中談「中華共同體」〉，《聯合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四版。

^⑳ 陶百川，〈兩岸和平共存互助之道——從中華共同體到中華國協〉，《中國時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㉑ 王永慶，〈掃除眼前陰影，開展光明前程——我對當前國是的感言〉，《自由時報》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今後要在臺灣繼續推動勞力密集產業，發展空間確屬有限必須設法移轉。……其轉移的唯一選擇即為大陸，此一情勢必將促成雙方今後關係如同唇舌，彼此相依為命。

另一位企業家辜濂松也有類似說法：「爲了發展經濟，求得政治穩定，兩岸關係宜走向雙贏而非零和之發展。大陸若致力於經濟繁榮與發展，並尊重臺灣，則兩岸關係必將進一步和緩，接濟結合也更密切，而達於雙贏之局。因此大陸更進步、更繁榮，則臺灣更安全，兩岸差距更小，對立也終將消失。」^{②③}最近也有學者提議海峽兩岸及香港等地形成「中華經濟圈」。^{②④}

(二) 對「經濟優先論」的批判

上述「經濟優先論」及其所導出的對海峽兩岸關係的論點，個別來看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其可以成立之理據。扣緊近數十年來人類所經歷的「資訊革命」的歷史潮流，以及

^{②③} 辜濂松，從經濟立國談臺灣經濟發展，〈中國時報〉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②④} 參考：Barry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由於改革開放所帶動的經濟發展來看，從經濟角度思考海峽兩岸關係確有其慧識，所以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第九任總統就職時，就在美國著名政論性雜誌《國家評論》發表論文，指出中國大陸正進行經濟改革，繼續試行選舉，並嘗試教育民眾，這些工作對於一個擁有十億以上人口的國家而言，可說是一大挑戰，在在需要外界的幫助，而中華民國早已準備伸出援手。臺灣願意考慮共同投資，幫助大陸重建國營企業並建立現代市場經濟，也很樂意協助大陸的農業發展。^⑤這種看法在一個「意識型態的黃昏」的二十一世紀前夕提出，確能打動人心。

但是，海峽兩岸關係中的經濟因素卻也不能被過分誇大。除了經濟之外，海峽兩岸華人的歷史意識，更是決定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質言之，「經濟優先論」者在處理海峽兩岸關係時常不免陷入三項盲點而不自知：

(1) 將人完全視為「經濟動物」(Homo Economicus)，而寄望全球性經濟活動解決區域性政治爭端：「經濟優先論」的洞見在於正確地掌握人是生活在經濟活動網路中的動物這項特質，但是人的這項特質不能被過度解釋為：「政治領域」只是「經濟領域」的擴大與延伸，「全球性的『經濟』邏輯」(大前研一所謂"Global Logic")可以解決地域性的政治問題。

^⑤ 李登輝，〈中國之未來〉，刊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九日，第二版。

例如 Peter F. Drucker 最近所說，在全球經濟的大潮流中，民族國家仍展現強韌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控制國內財政與貨幣政策、對外經濟政策、國際商貿關係以及戰爭等方面，國家仍有絕對的影響力。²⁶

更精確地說，在華人地區如臺灣與大陸的「政治領域」不只是諸般經濟性的利益之折衝協調場所而已，它更是各種意識型態、歷史意識甚至文化使命感互相鬥爭的競技場。在處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係時，我們必須注意華人地區的「政治領域」不能完全被化約為「經濟領域」；「民族的」或「民權的」問題也不能完全從「民生的」角度加以解決，海峽兩岸之關係涉及雙方人士的歷史意識與歷史情感問題。²⁷

(2) 「經濟優先論」者常因過度強調經濟「全球化」而忽視「地區化」之趨勢：自從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兩個潮流特別顯著：一是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而來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或「超國家化」(Transnationalization) 的趨勢，使國與國之間乃至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人為阻隔逐漸泯除，所謂「地球村」日益成爲事

²⁶ Peter F. Drucke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vol.76, no.5, pp.159-171.

²⁷ Chun-chieh Huang, "Mutual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 Basis for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未刊稿本)。

實；二是在國際化的大潮流中，全球各地的尋根意識日益覺醒，「向本土回歸」的「本土化」(Localization)趨勢，也蔚為歷史主流。「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歷史趨勢相激相盪，互補互利，形成辯證性的發展關係。大前研一及其追隨者常強調「全球化」而對同時並進的「本土化」趨勢未能賦予足夠的注意。

事實上，「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潮流之間存有既不可分割又互相競爭的關係。這種辯證性的關係在戰後臺灣（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七月戒嚴令廢除以後）以極為鮮明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等問題在最近十多年來的臺灣，都一再顯示以上所說的「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辯證性張力。而且，更弔詭的是，在後戒嚴時代臺灣知識分子心目中所謂的「本土化」，實際上包括兩種互為緊張的趨勢，一是在「本土」相對於「西方」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的手段；另一個趨勢是在「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的手段，兩者不僅脈絡不同，而且涵義也互有出入。臺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正是處於世紀末「全球化」與「本土化」兩大歷史潮流迴旋激盪的歷史脈絡下所激發的課題。

(3) **大前研一及其追隨者通觀全球經濟體系，而忽視了華人社會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有其重疊性：**近代西方世界的「政治認同」建立在契約論的基礎之上，人民以納稅及服兵役換取「國家」的保護。但是，在華人地區中「政治認同」常與「文化認同」深刻地糾

纏在一起，並互相加強。

我們可以日據時代（一九八五—一九四五）臺灣知識分子的「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為例，說明這一點。日據時代許多臺籍知識分子將中國大陸視為他們的「祖國」，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壓迫所激起的，另一方面是臺灣的漢人在日據時代有相當強烈的漢文化認同，他們將大陸視為文化及歷史的「原鄉」。這種「祖國意識」將臺灣與中國大陸視為有機的文化整體，而不是機械的對抗的敵體。存在於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裡的「祖國意識」，基本上是一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祖國」在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心目中是一種歷史的共業，這種共業以對漢文化的認同為其基礎。這種「集體記憶」是由當代人的生活經驗（尤其是日本人的殖民與壓迫）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中的記憶者是作為群體文化的一分子的個人進行記憶，而不是一個與群體無關的個體在進行記憶。^⑧這段具體的歷史經驗顯示：在華人社會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實存有交互影響之複雜關係。

^⑧ 參看：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大陸經驗——「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收入：黃俊傑，〈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四輯（高雄：陳中和基金會，一九九七）；Chun-chieh Huang,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Taiwanese Nostalgia for Cultural China (1985-1950)"（未刊稿本）。

綜合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說：大前研一的全球性以及地區性經濟的興起的論述，雖然勝義紛披，但是，他所宣示的「民族國家的終結」這項判斷，對華人地區的大陸與臺灣而言，可能仍言之過早，確實有其不相應之處。

四、以文化交流促進海峽兩岸人民歷史經驗之共享

經過本文第二節與第三節的論述，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的看法：(1)臺灣與大陸之間除了經濟的交流之外，更應加強文化的交流。(2)在文化交流中，尤應以歷史經驗的交流促使兩岸人民分享對方的歷史經驗，從而獲致真心的相互瞭解。我們闡釋這兩項論點。

(1)我主張在目前海峽兩岸官方與民間所熱中的經濟交流之外，再特別加強文化交流，主要的理由有二：(a)近百年來臺灣與大陸由於政治原因，文化聯繫嚴重斷裂，亟待重建。自從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臺灣以後，臺灣與大陸的聯繫就日趨淡薄。一九四九年國府遷臺，海峽兩岸從互不往來，直到近年才開始重新往來。雙方文化的斷裂，使人民之間隔閡日深。(b)不

論是在臺灣地區或是大陸地區，最近五十年來文化發展的最大問題，在於一方面由於受到非文化領域的干擾與支配，而使文化領域的自主性受嚴重的傷害；另一方面則在文化領域內部的諸多文化元素之間，形成衝突乃至對抗的關係，從而使得文化內部的生機受到傷害。²⁹爲了癒合以上兩種層次的文化斷裂，未來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有待加強。

(2)但是，文化交流業務牽涉多方，其中最爲重要的當是雙方人民歷史經驗的交流。我主張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應超越官方而從人民的歷史經驗的交流開始，主要是因爲從一八九五年以後，臺灣與大陸由於政治的分裂甚至對抗，雙方人民並未參與並分享對方的歷史經驗，誤會乃由歷史的斷裂而產生，這種由於歷史的斷裂而來的歷史意識的誤置，將會因爲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的玩弄與曲解，而爲之深化。

近百年來臺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進程，也塑造了他們互異的國家觀與世界觀，凡此皆影響了雙方人民對「國家認同」的不同理念。

針對此一問題，臺灣與大陸的文化交流，應本於「**從人民立場出發**」之原則，透過各種有關歷史經驗之回顧與探討的活動，致力於消除雙方人民歷史意識之差異，從而厚植雙方人

²⁹ 參看：黃俊傑，〈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的發展：問題解析與未來展望〉，收入：《兩岸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一九九六年四月），頁二五五—二六八。

民真正了解之基礎。

具體地說，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飽經動亂，憂患相繼。公元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以其激烈的排外主義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後，清廷向各國宣戰，接著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城，次（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簽訂，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達於高潮。一九一一年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孫中山先生一九一二年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但是，民國成立以來，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動亂歲月，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進一步暴露侵華野心；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接著是軍閥混戰，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使生靈塗炭，直到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中國才在形式上歸於統一。但日本軍閥侵華野心日益高漲，步步進逼，終於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引爆蘆溝橋事件，中國全面對日抗戰。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人民流離失所，苦難遍嘗。抗戰勝利之後，卻又繼之以國共內戰，終於大陸政權易手。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人民在共黨統治之下，又歷經「反右」（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等一系列的浩劫，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案件而達到一個高潮。近百年來在大陸的中國人民所經歷的是一連串的悲劇命運與民族的挫折，所以他們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得民族主義仍是當前大陸的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較難以理解現代社會將個人生命的尊嚴、自由民主價值的追

求置於國家認同之上的思考方式。

但是，最近一百年來的臺灣則與中國大陸走在不同的歷史道路上。自從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臺灣以後，早期武裝抗日運動此起彼落，一九二〇年代以後也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日據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臺灣從傳統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的關鍵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固然剝削臺灣的各種資源，但是也積極從事各種建設，舉例言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從基隆到打狗（高雄）鐵路夜間通車，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一九三〇年四月十日建設長達十年（一九二〇—一九三〇）的嘉南大圳正式供水，一九三一年高雄第二火力發電廠所開始供電。這些下層結構的建設，在相當的程度內奠定了臺灣邁向現代化的基礎。³⁰這一段歷史經驗使臺灣地區居民較易於接受近代西方的政治價值理念。

以上所說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人民近百年不同的歷史經驗，這是造成雙方人民之誤解的重要歷史根源。因此，透過歷史經驗的交流與分享而進行的文化交流，是緩和海峽兩岸現階段的緊張性的重要途徑。

³⁰ 參看：黃俊傑，〈歷史意識與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收入：氏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頁二二—二一五。

五、結論

這篇論文從歷史解釋分析當前臺灣與大陸的「國家認同」問題，我們的分析顯示：在華人社會中，「國家認同」與「歷史經驗」深刻地糾纏在一起。臺灣與大陸官方及民間人士，論述不同版本的「國家認同」時，多從中國近代史及臺灣史的解釋出發。這種「**透過歷史解釋以論證國家認同**」的思維方式，正是華人文化傳統的重大特徵之一。中華文化中常見的思維方式之一是「具體性思維方式」，而「歷史思維」正是「具體性思維方式」最常見的一種表現。^⑩在華人文化中，哲學命題常常透過歷史論述而提出，「國家認同」也經由歷史事實

^⑩ 所謂「具體性思維方式」是指從具體情境出發進行思考活動，而不是訴諸純理論或抽象的推論。這種思維方式將抽象命題（尤其是倫理學或道德論的命題）置於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中，引用古聖先賢、歷史人物，或往事陳跡加以說明，以提升論證的說服力。參考：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一九九三年三月），頁三六一—三九〇，收入：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六），頁一—三四；Chun-chieh Huang,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

之選擇與解釋而建構。本文的探討可以充分印證這一項看法。

其次，本文的探討提示我們：海峽兩岸近百年來由於歷史的斷裂而使兩岸人民經歷不同的歷史經驗，從而塑造了不同的歷史意識。因此，海峽兩岸的交流，除了經貿往來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雙方人民的歷史經驗的共享，是當前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作。（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初稿；十一月十七日二稿，本文曾刊於：黃俊傑等編，《臺灣的文化發展：世紀之交的省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一九九九）

sties," in Chun-chieh Huang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J.Brill, 1995), pp.72-88.

引用書目

中文專書：

林滿紅，〈四百年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一九九四）。

中文論文：

中共國務院，〈中共國務院政策白皮書：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轉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王永慶，〈掃除眼前陰影，開展光明前程——我對當前國是的感言〉，《自由時報》，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李登輝，〈中國之未來〉，刊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九日，第二版。

金耀基，〈在世界「冷和平」中談「中華共同體」〉，《聯合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四版。

國統會，〈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摘要）〉，收入：《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九九四）。

——，〈國家統一綱領〉，收入：《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九九四）。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收入：《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九九四）。

張景森，〈如何改造臺灣的經濟地圖？〉，《中國時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一版。

陶百川，〈兩岸和平共存互助之道——從中華共同體到中華國協〉，《中國時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辜濂松：〈從經濟立國談臺灣經濟發展〉，《中國時報》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收入：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六）。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大陸經驗——「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收入：黃俊傑，《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四輯（高雄：陳中和基金會，一九九七）。

——，〈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的發展：問題解析與未來展望〉，收入：《兩岸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一九九六年四月）。

——，〈歷史意識與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收入：氏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

臺灣教授協會等，〈兩國兩治，和平共存——臺灣人民對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十四版。

蕭欣義，〈一個「文化中國」之多元政治認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一期（一九九八年春季）。

蕭新煌、蘇耀昌，〈剖析中國三角：中、港、臺經濟向心力和政治離心力的動態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二期（一九九八年秋季）。

英文專書：

Lilley, James R. and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aughton, Barry,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

Ohmae, Kenichi, *The Borderless World*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0) · 中譯本·黃柏棋譯·《無國界的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三)。

———,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5) · 中譯本·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六)。

英文論文：

Chang, Jaw-Ling Joanne, "The Taiwan-Strait Crisis of 1995-1996: Causes and Lessons,"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thesda: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Drucker, Peter 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vol.76, no.5.

Huang, Chun-chieh, "Mutual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 Basis for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

ture" (未刊稿本)

——,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 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in Chun-chieh Huang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J.Brill, 1995).

——,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Taiwanese Nostalgia for Cultural China (1985-1950) ". (未刊稿本)

Ohmae, Kenichi, "Putting Global Logic Fir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1995.

Shen, Chun-shan, "Reflections o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